

## 美國聯邦法院裁判貪污罪案件的省思

張瑋心\*

- 壹、爭議案件提出
  - 一、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
  - 二、違背職務行為之判斷
- 貳、貪污罪適用之「公務員」
- 參、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
- 肆、United States v. Ganim 案判例
  - 一、事實經過
  - 二、被告否認全部指控
  - 三、原審法院拒絕重新量刑
  - 四、「客觀認定」法則確立
- 伍、結論
- 陸、法學英文
  - 一、原文裁判摘要
  - 二、實用法律語彙

關鍵詞：貪腐、賄賂、期約、交換條件、恐嚇勒索。

### 摘要

公務員為人民公僕，薪資來自納稅人；本應操守廉潔、戮力從公，盡其本分。若貪污腐敗，除破壞法律秩序，腐蝕社會根基外，也一併影響政府公信力，降低國家競爭力。揆諸世界各國的司法部門，無有不將公務員貪腐之治理列為二十一世紀首要工作重點的，又打擊此類犯罪之成效，往往能彰顯一個勤政廉能的政府、勇氣膽識的執法人員，更是擄獲民心的法寶，故而美國檢察官的亮眼成績單上，是絕對少不了查辦此類犯罪的功績。惟查近年我國公務員犯職務上不正行為而有涉銀行法、貪污治罪條例的案件，檢察官上訴最高法院的案件

不少，卻成功機率偏低，足證法官、檢察官對於適用條文的解釋和認定標準不太一致。本文爰引介美國康乃迪克州布里奇波特市前市長的貪污案及操作手法，說明美國聯邦法院裁斷本罪構成的檢驗法則，冀供我國刑事司法機關參考。

### 壹、爭議案件提出

十年前國際透明組織就曾指出企業貪腐、金融犯罪之最終目的，即為獲得不法所得，故追蹤來源不明財產、沒收不法所得、使此類犯罪者無法享有其犯罪所得，或求處重刑兼併科犯罪所得相當之金額，素來被公認為嚇阻此類犯罪最有效之方法。此類犯罪若牽涉公營事業單位則和貪污治罪條例的行為重疊，如違反銀行法、

犯職務上索賄、收賄、期約等不正行為，或違背職務行為，惟貪污罪適用公務員身分。以下援引爭議案件討論：

一、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

本件上訴人為被告、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檢察署檢察官，分別因被告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第二審判決（一〇三年度上訴字第四一三號，起訴案號：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一〇二年度偵字第二一四四九號），提起上訴（被告對有罪部分上訴、檢察官對無罪部分上訴）。我國最高法院判決駁回。本案的爭點在於檢、院就被告「財產來源不明」部分能否與犯罪所得連結的判斷不同<sup>1</sup>：

檢察官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吳姓員警（下稱‘被告’）因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職務上收受賄賂等罪嫌，檢察官搜查被告住所時，在書房儲物櫃第二、三層抽屜，分別發現現金七十二萬九千五百元（下稱甲筆現金）及一百零三萬七千三百元（下稱乙筆現金）而查扣之。經檢察官命被告就該來源可疑之不明財產提出說明，詎被告：（一）甲筆現金係伊於一年前，幫一〇一年底因癌症過世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貴師」之成年男子（下稱貴師）處理土地糾紛所獲得之八十萬元使用後之款項，及廖宗恩給伊之每月一萬元紅利累積而來，但無法提供貴師究係何人。另就乙筆現金，先稱：我想不起來，又改稱：應該是慢慢存的，末稱：我實在

想不起來等語。（二）次於一〇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改口說明：該現金其中有九萬元是擔任第六分局總務工作先行收取之搭夥錢，三十萬元是陳某於一〇二年七、八月間所償還之借款，另二百三十萬元是伊的薪水收入、年終獎金慣常於提領後放在家中，及與配偶陳女士共同之存款等語。（三）再於一〇二年十一月八日，無視陳女士已在偵查中證述上開現金與之無關，竟仍稱說：伊猜想陳麗文應係怕被查稅，才證述這些錢不是她所有等語。就上開現金來源，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等情。因認被告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之一之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嫌。並以證人即被告之配偶陳女士證述該二筆現金非其所有，被告僅係員警之公務員身分，其薪資係撥付銀行帳戶，非現金支付，卻有金額多達一百七十餘萬元放置住處，與公務人員首重廉潔自持之開支用度狀況不成比例，顯有違常情，因認該款項為「來源可疑之財產」，被告前後說明供述不一，已無法證明現金來源，為其主要論據。

法院駁回理由：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之一之修正理由固稱本罪之增訂係為發揮舉證責任轉換之功能，然參酌本罪立法目的在於因應「貪污具有隱密性，被發現時常已距犯罪時日甚久，證據可能已被湮滅，犯罪所得多被隱匿，查證頗為困難，影響打擊貪腐之成效」。惟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關於被告犯罪事實仍負有舉證責任之法定義務，立法理由所稱之舉證責任轉換，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School of Law,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ina.

<sup>1</sup> 最高法院 104 年臺上字第 143 號刑事判決。

應僅限於為避免檢察官難以證明該財產之來源為貪污所得，而於所指出之證明方法已堪認被告符合本罪上揭一至三所示之構成要件後，身為公務員之被告始就被指來源可疑之財產負合理說明義務，並證明該財產係合法取得，以達有效杜絕貪污，兼顧人權保障之立法意旨，非謂檢察官得全然卸免本罪之舉證義務。本件檢察官查扣之一百七十六萬餘元，相較於吳某及其配偶三年內收入，並非「顯不相當」，已如前述。公訴人所舉證據，並未達於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難認舉證責任已生轉換效果，則被告對其財產說明義務尚未發生，縱前後說明供述不一，亦難逕以本罪論擬。

分析：按公務員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以及其他法定之罪嫌，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公務員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自公務員涉嫌犯罪時及其後三年內，有財產增加與收入顯不相當時，得命本人就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不明來源財產額度以下之罰金。貪污治罪條例於一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修正公佈之第六條之一定有明文。依該條之條文內容，可知其犯罪構成要件如下：一公務員犯該條所示之各罪。二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公務員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自公務員涉嫌犯罪時及其後三年內，有財產增加之情況。三上開期間內增

加之財產與收入顯不相當。四經檢察官命公務員本人就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而有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之情形。

次按貪污治罪條例第 10 條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自犯罪時及其後三年內取得之來源可疑財產，**經檢察官或法院於偵查、審判程式中命本人證明來源合法而未能證明者，視為其犯罪所得**。檢閱檢察官的公訴意旨，說明詳盡，並沒有舉證不足之錯誤；而法院認檢察官未盡舉證責任的理由，執指查扣之現金與被告收入未達「顯不相當」之程度，不免有些牽強，難道坐擁高薪者不會涉犯貪污罪？況且財產來源不明的嫌疑本來就屬調查貪污罪的重點。又被告才是應為自己積極辯護的一方，不是法官，更遑論被告確實未能證明財產來源合法。固然被告因犯職務上的不正行為已成立數罪，加上所收受的金額和千萬、幾個億相比，算不上嚴重，倘衡酌被告行為屬‘小貪’、或有其他憫恕情節者，本於刑罰之寬典，不添此罪以勉自新，尚屬法官裁量範圍。但法院遽以「舉證不足」駁回檢察官上訴質疑的理由，不僅徒生適用法律操作之困難，也使法律的解釋與條文本身的明確性起衝突。

## 二、違背職務行為之判斷

本案上訴人為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檢察署檢察官，因被告違反銀行法等罪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南

分院中華民國一〇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第二審更審判決（一〇三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三四號，起訴案號：台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八年度偵字第五六二八號、九十九年度偵字第三五一〇、四一九二號），提起上訴，最高法院判決駁回。本案的爭點在於檢、院就被告有無「違背職務行為」的判斷標準不同<sup>2</sup>：

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自九十五年間至九十八年四月一日，在北港一銀擔任理財專員；九十八年四月二日調為總務兼會計。其於原判決附表二、三所示之日期雖非擔任櫃員工作，惟依第一銀行所提出之「第一商業銀行理財業務人員行為守則」、「業務處理細則—會計篇」，該銀行理財業務人員主要職務包括「業務法規程式與推展方案」、「理財諮詢服務與商品推介」、「客戶關係維護開發與管理」、「執行售後服務工作」、「市場資訊回饋與處理」、「財富管理業務資訊系統與客戶資料之維護、與分行作業部分及非財富管理業務部門之同仁建立或共同維護良性互動關係整體合作服務客戶」，以及「其他交辦事項」。而本件被告偽造客戶之取款憑條，即有違其應「執行售後服務工作」之職務上行為。且被告利用其他行員鬆懈之心，輕易從北港一銀金庫取走新台幣一千萬元現金之行為，亦有違背其應與銀行同仁間「共同維護良性互動關係整體合作服務客戶」之職務上行為；原審漏未審酌及此，顯有違誤。

法院理由：被告於本件所為之犯

行，或係以詐術使客戶同意而提款，或盜用客戶之印章、偽造客戶取款憑條持以行使，以詐領客戶銀行帳戶存款；被告於客戶福祺公司通知其將吳庭羽帳戶內存款提出轉存福州公司帳戶，惟其於領款後即予以挪用，或向該銀行職員郭玲華謊稱客戶欲提領現款而進入銀行金庫取款等情，其犯罪方法或態樣雖有不同，惟俱非屬該銀行理財業務人員或會計兼總務人員之職務行為。至原判決附表二編號 1 至 11、23 所示犯行部分，雖屬銀行理財專員業務上所延伸範圍之事項，但被告此部分犯行，僅係利用其職務上之機會或便利而為，尚難遽認被告所為係屬「違背其職務之行為」，核與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二第一項之銀行職員違背職務罪之構成要件不合，自無從依上述罪名論處等情綦詳。是原判決以被告所為核與上述罪名之構成要件有間，而認為不成立上述罪名，並因而變更檢察官起訴法條，就被告上述犯行部分，分別改依刑法第二百十條、第二百十六條之行使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其中有一部分想像競合犯詐欺取財罪）、修正前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之詐欺取財罪，及同法第三百三十六條第二項之業務侵佔等罪論處，經核於法尚無違誤。

分析：按銀行法第 125-2 條第一項，銀行負責人或職員，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銀行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銀行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sup>2</sup> 最高法院 104 年臺上字第 2243 號刑事判決。

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其犯罪所得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本文以為被告係一銀行員，應先予釐清是否屬公務員，若為肯定，被告之行為容有落入本條之適用。況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特別法應優先於普通法適用，至罰金要否併科屬法官裁量範圍。是所謂職務上之行為，指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行為而言<sup>3</sup>，祇要該行為與其職務具有關連性，即屬相當<sup>4</sup>。另外，銀行法之立法目的是為杜絕金融犯罪、穩定金融秩序，不限公股行庫，而公務員依社會一般通念，被賦予較高的職業操守標準，所以人民普遍也認為公股行庫比其他銀行安全。最高法院未能就此部分釋疑，殊為可惜。

#### 貳、貪污罪適用之「公務員」

為規避不法利益的追查，常見涉案行為人改以收受現金、口頭允諾交換、設立海外或紙上公司、通過中間人作為白手套等，各式各樣掩人耳目的手法，因此少有留下‘期約’書面證物的情形。對此，美國聯邦調查局、檢察官、法院在累積多年的辦案經驗後，逐漸已在默契上形成共識，即要破獲此類犯罪的關鍵在「人證」。我國貪污治罪條例適用之行為人，屬身分犯，惟「公務員」涵攝之對象範圍很

寬，本條所適用之公務員，包括哪些？以下援引最高法院之解釋說明<sup>5</sup>：

按 94 年 2 月 2 日修正公佈(95 年 7 月 1 日施行) 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第一款所定之公務員，其前段所謂「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之人員，係指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中依法令任用之成員，即學理上所稱「身分公務員」。此類型公務員，著重於其身分及所執行之職務，祇須「具有法定職務權限」，為公務員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事務，即應負有特別保護義務及服從義務，不問該項職務是否為涉及公權力之公共事務，均屬之。至於後段所稱「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即學理上所稱「授權公務員」。此類型公務員，並非服務於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但具有「依其他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因其從事法定之公共事務，故應視為刑法上之公務員。此類「授權公務員」，依立法理由說明，例如依水利法及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相關規定而設置之農田水利會會長及其專任職員；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之各公立學校、公營事業之承辦、監辦採購等人員，均屬修正後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第 1 款後段所定「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關於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之各公立學校、公營事業之承辦、監辦採購等人員，應不以實際承辦、監辦採購之基層人員為

<sup>3</sup> 最高法院 106 年度臺上字第 262 號刑事判決。

<sup>4</sup> 同前註。

<sup>5</sup> 最高法院 106 年臺上字第 262 號刑事判決。

限，其依規定層層審核、核定各項採購程式之辦理採購人員包括各級主管，甚至機關首長及其授權人員，倘實質上具有參與決定、辦理採購程式之權限，足以影響採購結果，應均屬之，始符立法本旨。

另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依政府採購法第 112 條規定之授權，訂定發布採購人員倫理準則，所稱採購人員，係指機關辦理政府採購法採購事項之人員，即包括處理訂定招標檔、招標、開標、審標、比價、議價、決標、訂約、履約管理、驗收及爭議處理之人員。而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自招標、決標（包含開標、投標、審標）、履約管理（包含訂定採購契約、對工程採購之分段查驗）至驗收，均屬完成採購作業之各階段行為，具有連貫性，不容任意予以割裂。再參諸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有關公務員規定修正立法理由之說明，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之公立學校承辦、監辦採購等人員，其採購案倘應適用政府採購法時，即非純粹之私法關係，仍屬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共事務。

誠如最高法院判決所揭：學校辦理午餐，其主、副食品之採購，應參照政府採購法及相關規定辦理。而學校午餐之管理及輔導，由學校校長、各處室主任、組長、教師、職員、家長會代表及學生自治幹部組成之學校所組織「學校午餐工作推行委員會」，負責營養午餐事務之推動、辦理，其性質應符合「公共事務」定義。許、楊、蔡、曹等被告於承辦營養中央餐廚採購案事務時，係依政府採購法第

94 條及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4 條、第 3 條等相關規定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從事於營養中央餐廚採購案之招標、開標、訂約、履約、監督，該事項涉及國家為促進教育文化公共行政目的之達成，係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授權公務員」。再學校辦理營養午餐制度，即寓有增進學童健康與照顧弱勢家庭學童之教育促進政策意旨，實屬國家給付行政生存照顧之一環，國家作為此服務唯一或主要之提供者，仍具備特殊之法律關係與高度之影響力，不因學童可自行依意願選擇訂參與否而不同，自與國計民生有關。被告等上訴意旨仍執其等並無驗收之法定職權，且所從事者與國計民生無關，爭辯其不具公務員身分云云，殊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 參、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

另外，貪污治罪條例下所涵蓋的不正行為，應如何採認其屬於「違背職務行為」或僅「構成職務上犯行」？參照我國最高法院解釋，按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稱「職務上之行為」，係指公務員在其職務權責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行為而言。亦即指其權限範圍內之事項，而不違背其義務責任者。反之，若在其職權範圍內，不應為而為之，或應為而不為，或不正当為之，而與其職務上之義務責任有所違背者，則應屬同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謂之違背職務之行為。因此，若公務員受賄之原因，係為其職務上應為或得為之行為者，則

受賄人應成立同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罪」。反之，若受賄之原因，係為其職務上所不應為，或應為而不為，或以不正當方式為之，而違背其職責者，則應成立同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罪」，兩者之要件迥不相同，不可不辨<sup>6</sup>。

次論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sup>7</sup>，是指所收受之金錢或財物與其職務有相當對價關係，始足當之。而所謂職務上行為之對價關係，除客觀上應審酌職務行為之內容、交付者與收受者之關係、賄賂之種類、價額、贈與之時間等情形外，亦應審究交付者與收受者主觀上之認識而綜合判斷。如交付者本於行賄之意思，以賄賂買通公務員，冀求公務員職務範圍內踐履特定之行為，而公務員明知交付者係對於其職務上行為行賄，猶明示或默許允為行賄者所冀求之職務上行為，進而收受，則其收受財物與其職務上之行為，即具有對價關係。

又公務員為其職務上之特定行為在先、收受他人交付之財物在後之情形，是否可認二者間具有對價關係？除該公務員事先有要求、期約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外，應研求該公務員於為職務上特定行為之時，主觀上有無將因之收受財物之認識為斷；苟公務員為職務上特定行為之時，主觀上有將因之收受財物之認識，而後交付

者主觀上又係因該公務員先前為職務上特定行為之原因而交付財物，仍應認該公務員收受財物，與其先前職務上之特定行為，具有對價關係。

若公務員為職務上特定行為之時，主觀上並無將因之收受財物之認識，則不能認該公務員事後收受財物，與其先前之職務上行為間，具有對價關係，即無可成立上開罪名。故公務員為職務上特定行為之時，其主觀上有何將因該特定行為而收受財物之認識，亦即有何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所收受之財物與其所為特定行為二者有如何之對價關係，自應分別在科刑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內明確記載，並說明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方足資為適用法令之基礎。此節就「被告主觀上」的認定，恐有疑問，倘若通過白手套收受財物，可能不利檢察官追查到最上層參與人。查美國法上打擊貪腐案件，只要中間人、財務交付人等供述屬實，被告的主觀在所不問，蓋因被告通常都會否認，從而改以客觀上去認定被告知情才能切合實際。

另就收受次數，採一罪一罰，此部分台、美法院的判斷標準一致。舉例，被告乙上訴意旨略稱<sup>8</sup>：甲為求順利領取所承作「五峰鄉桃山村土場溪清疏工程」之工程款，而分別於 100 年 10 月 26 日及 101 年 1 月 20 日交付不正利益及賄款。乙主觀上為協助甲順利領取上開工程款，所分別收受甲交付之賄款及不正利益，係為達同一

<sup>6</sup> 最高法院 98 年臺上字第 2101 號刑事判決。

<sup>7</sup> 最高法院 106 年臺上字第 184 號刑事判決。

<sup>8</sup> 同前註。

目的，且時間密接，侵害同一國家法益，難以區別，自屬一收受賄賂行為之接續施行，原判決割裂而論以二收受賄賂罪，顯有違法。

法院駁回理由強調<sup>9</sup>：所謂接續犯，係指行為人之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行，而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始足當之。甲因以泰嘩公司名義得標承作五峰鄉公所發包之「多功能體育館補照暨整建工程，基於對公務員關於不違背職務行為而交付不正利益之犯意，而於 100 年 10 月 26 日向旅行社代付乙、丙（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往返臺北、澳門之機票費用 1 萬 9600 元，乙則基於對職務上行為收受不正利益之犯意聯絡而收受上開不正利益。復於 101 年 1 月 20 日至五峰鄉公所請領上開工程之第一期估驗工程款時，因乙表示欲請領工程款需支付金錢等語，乙則與丁（五峰鄉公所所長，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共同基於對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聯絡，由乙收受甲交付之 5 萬元，再全數轉交丁等情。則乙收受之不正利益及賄賂來源雖同屬甲，然前者係擔任俗稱之「白手套」，出面收受賄賂後，全數轉交丁；後者則係自行收受機票招待之不正利益，兩者犯罪之決意、方法均不相同，且時隔多月，並無獨立性薄弱而難以區分之情形。

<sup>9</sup> 同前註。

#### 肆、United States v. Ganim 案判例

綜觀美國公務員貪腐的態樣，主要是通過「白手套」進行期約、收受財物之手法居多，還有引誘、指導企業雇用身邊人充任「顧問」名義者，並支付該指定人薪資的方式，藉以規避 FBI 之追查。美國聯邦調查局、檢察官在查辦貪腐案件上，累積了不少豐富經驗，成效上頗有心得；而各州上訴審法院也建立了認定構成貪污罪的法則。以下引介美國康乃迪克州 Bridgeport 前市長的貪腐案說明<sup>10</sup>：

##### 一、事實經過

本件被告兼上訴人 Joseph P. Ganim（下稱 Ganim），為美國康乃迪克州 Bridgeport（下稱「布里奇波特市」）的前市長，不服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判決結果，提起上訴。原審認定 Ganim 成立貪腐等多項罪名，包括：敲詐勒索（*racketeering*）<sup>11</sup>、共謀敲詐（*racketeering conspiracy*）<sup>12</sup>，恐嚇取財（*extortion*）<sup>13</sup>、違反誠信服務、郵件詐騙（*honest services mail fraud*）<sup>14</sup>、接受涉及聯邦地方預算計劃案的賄賂（*bribery involving programs receiving federal funds*）<sup>15</sup>、密謀犯收受賄賂（*conspiracy to commit bribery*）<sup>16</sup>、公務人員不實所得申報（*filing false income tax returns*）<sup>17</sup>，Ganim 被判處

<sup>10</sup>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Joseph P. GANIM, Docket No. 03-1448-cr. (2007).

<sup>11</sup> 18 U.S.C. §1962(c).

<sup>12</sup> 18 U.S.C. §1962(d).

<sup>13</sup> 18 U.S.C. §1951.

<sup>14</sup> 18 U.S.C. §1341 & 1346.

<sup>15</sup> 18 U.S.C. §666(a)(1)(B).

<sup>16</sup> 18 U.S.C. §371.

<sup>17</sup> 26 U.S.C. §7206(1).



有期徒刑 108 個月及併科罰金。本案由美國聯邦上訴審法院第二巡迴法院（下稱‘本院’）受理審查。

首先，在本件上訴理由中，Ganim 指摘：檢方要證明他除了所得申報事件之外的全部罪行，必須能將每一個他經手收受的利益與他每個特定的官方行為連接起來。美國聯邦第二巡迴上訴審法院駁回被告上訴理由中強調：檢方不需要證明直接的連結，並結論陪審團在法律上已做出適當裁斷。另就今天提出的一份命令摘要，本院拒絕 Ganim 對於原審判決理由的其他懷疑與挑戰，並且重申：（一）大陪審團起訴書已充分說明對被告的各項指控；（二）檢察官的指控詰語不等於不法行為證明的逆推；（三）在一名陪審員報告說她可能不適任後，原審法院拒絕陪審團的評議暫停，這項決定沒有錯誤；（四）依循 Crosby 案的判決要旨，本院判決被告重新量刑的程式合憲、判處之刑罰也是合理的。爰此，原審判決應予維持。

本件事實經過，緣被告 Ganim 於 1991 年至 2003 年法院判決有罪期間，一直擔任康乃迪克州布里奇波特市的市長。Ganim 作為市長，有責任監督管理市政府全面業務之運作，並且有權在他職責範圍內涉及市政的契約做出最終決定。在他第一次競選市長期間，Ganim 認識了擔任媒體顧問的 Leonard J. Grimaldi（下稱 Grimaldi）和嗣後擔任他司機兼助理的 Paul J. Pinto（下稱 Pinto）。在接下來的幾年裡，Ganim 與 Grimaldi 和 Pinto 發展了密切合作的關係。Grimaldi 隨後成立了一個名為“港口通訊”（Harbor

Communications）的公關公司，而他本人正是這間獨資企業內唯一的一位老闆兼員工。Pinto 則成為該市一間建築工程公司，Kasper 集團，的董事（嗣後收購）。

#### （一）PSG 標案契約

在 1995 和 1996 年間，布里奇波特市正在考慮將其汗水處理設施進行私有化。Ganim 建議 Grimaldi 聯繫專業服務集團（PSG），並以擔任 PSG 公關顧問的身分參與投標水處理的工程計畫。Grimaldi 於是聯繫了 PSG，要求其聘請他擔任顧問，每月薪資為 3 萬美元。PSG 同意後提交了一份投標契約書，並作為另一個由 Pinto 和 United Properties（下稱‘聯合物業’）代理的競標公司。聯合物業的經營人 Albert Lenoci, Sr.和 Albert Lenoci, Jr.（下稱‘the Lenocis’家族）都是 Ganim 的政黨捐獻人。

投標作業完成後，Ganim 告訴 Pinto，他決定將標案契約給 PSG，但是 Pinto 應在 PSG 和聯合物業之間安排一筆金融交易，因為他不想在兩個大支持者之間做選擇。Ganim 告訴 Pinto，如果他們想要這筆交易，他們就照著做。Pinto，反過來向 Grimaldi 解釋，如果 PSG 想贏得契約，就必須關照 Lenocis。Grimaldi 默許同意，正如同 PSG 對他的建議一樣。PSG 同意在契約存續期間，每年給 Grimaldi 支付 7 萬美元以上的顧問費用，他再轉給 Pinto 和 the Lenocis。Pinto 通知了 Ganim 此筆交易結果，Ganim 遂批准了由 PSG 承攬汗水處理設備的工程案。

在 1997 年 5 月至 1999 年 4 月間，

PSG 向 Grimaldi 支付了共計有 \$311,396 美元的顧問費，但 Grimaldi 並不是把所有的錢都支付給 Pinto。Grimaldi 和 Pinto 將這筆錢的一部分用來作為 Ganim 的福利使用，如娛樂、餐飲和服裝等消費。

#### (二) 酬金 50 / 50 共享協議

1996 年 12 月，Ganim 帶著 Pinto 和 Grimaldi 來到了亞利桑那州的圖森市 (Tucson, Arizona)。在這次旅行中，Ganim 告訴他們兩位，他們應該“聯合起來”，並同意與他們分享未來他們掙來與市政合作的各項交易款項，Ganim 會把契約標案給他們，作為回報，而他們則必須關照他的開銷和需要。在返回布里奇波特市之後，這三個人會面確認了此項協議。Grimaldi 出庭作證陳述，在那次的會面協議，他和 Pinto 都同意了下面條件：

錢的一部分將用以關照 Ganim。如果他需要現金，我們會給現金。如果他需要西裝，我們會給西裝。如果他需要襯衫，我們會給襯衫。任何他需要的東西，符合 50/50 條件安排者，我們都會照顧 Ganim。又作為交換，Ganim 會確保我們所有當事人從這座城市取得想要的工程，亦即 Ganim 會主導市政契約和工作。

根據酬金的共用協定，Ganim 從 1997 年 2 月到 1999 年 4 月間主導由 Pinto 和 Grimaldi 的客戶獲得某些市政的計畫項目。與此同時，Grimaldi 和 Pinto 則提供給 Ganim 現金、膳食、健身設備、名牌服裝、葡萄酒、珠寶和其他物品。又在那個時候，Grimaldi 依要求雇用了 Ganim 的妻子。在 Ganim 的堅持下，Grimaldi 給她的薪資必須高於一般水準，且給她的是現金，因此

沒有將她的收入報給國稅局。

#### (三) 布里奇波特市能源投資案

1998 年，Ganim 讓 Grimaldi 為他的一個能源企業客戶做安排，要求他捐款 100 萬美元以資助該市“清潔與綠化”(Clean & Green) 的宣傳計畫，此項目將拆毀並重建老舊的公有房產土地。接著，Ganim 安排了 Grimaldi 去監督廣告宣傳活動，並且由 Pinto 擔任 Lenocis 旗下一間公司的代表，去管理“清潔與綠化”計畫的款項。根據酬金共用協定，Grimaldi 和 Pinto 將從他們在這些項目中獲得的顧問費，拿出一半花用在 Ganim 身上。

#### (四) PSG 契約展延和 1 / 3 酬金均分

1998 年年底，PSG 要求長期展延其經營汗水處理設施的契約。在與 Grimaldi 和 Pinto 的會議上，Ganim 告訴 Grimaldi，他會支持契約展延。而作為交換的是，Grimaldi 與 PSG 重新談判契約，以獲取更多的顧問費報酬。Ganim 還指示另外三個人分攤這些報酬，以及未來與該市簽署的任何交易案都均分成 3 份報酬。而 Grimaldi 將 Ganim 的那一份付給幫 Ganim 持有的 Pinto。按照這些討論，Grimaldi 成功地與 PSG 重新協商了他的顧問費，於是，他就在一項前期的交易中獲得了 \$495,000 美元的報酬。1999 年 5 月 27 日，Ganim 批准了市府與 PSG 契約的展延。幾個星期以來，Grimaldi 支付了大約三分之二的顧問費（酬金）給 Pinto，其中三分之一是給 Ganim。Pinto 把 Ganim 的那一份和自己的錢混在一起，以避免被相關單位查察。

1999 年的大部分時間，Grimaldi 和 Pinto 供應給 Ganim 金錢和其他方面的福利，如葡萄酒、櫥櫃、家居裝修

和膳食等。Pinto 在審訊中陳述：“我手裡拿著 Ganim 的錢。當他需要錢，我會給他錢或依他指示我的方式去使用那些錢。1999 年 9 月，Ganim 和 Grimaldi 鬧翻了，導致最後 Grimaldi 停止支付 Ganim 的一部分錢給 Pinto。從那時起，Ganim 躲避 Grimaldi 並阻擋他的當事人取得與該市的合作契約案。

#### （五）壽險保單埋入預算項目

1999 年初，Ganim 試圖利用市政準備金為自己以及市政部門主管購買價值 100 萬美元的壽險保單，以作為掩護（安撫下面人馬）。他接近 Frank Sullivan（下稱 Sullivan），一個童年時期的朋友，現在他已經成為股票經紀人，兩人共同商議這筆生意。Ganim 在 1999 年 4 月批准了這些保單，但沒有得到市議會的准核。嗣購買保單遭媒體披露後，Ganim 寫信給 Hartford 人壽保險公司，要求終止他自己的那份保單，但沒有填寫適當的資料，以致於該份保單仍然有效。在會計年度結束時，Ganim 將這些保單埋入預算編列中作為簡易預算撥款的一項，並且通過了市議會的審查批核。

因為是 Ganim 保單的經紀人，Sullivan 在這件保險業績上獲得了 \$17,500 美元的傭金。Pinto 作為 Ganim 的代表，遂建議 Sullivan，如果想要和這個城市做更多的生意，他必須給付回扣。Sullivan 於是支付了 Ganim 和 Pinto 共計 \$5000 美元現金以作為報酬。

#### （六）養老金計畫

在 1999 的秋天，Sullivan 企圖成為兩項都市養老金計畫的經紀人，“計畫 A”和“計畫 B”。Ganim 讓 Pinto 告訴

Sullivan，如果他想要得到該職務，他必須將他百分之五十的傭金支付給 Ganim 和 Pinto。在 Ganim 的支援下，Sullivan 在 1999 年 9 月被指定為 B 計畫養老保險經紀人。次年，又在 Ganim 的支持下，布里奇波特市財務總監保留給 Sullivan 的投資商行以協助承做該市養老 A 計畫的保單。Sullivan 獲得了第一筆券商傭金 \$38,000 美元，他打算分給 Pinto 和 Ganim。然他們並沒有主動要求他們各自的酬備，因為此刻，他們正在為聯邦窮追不捨的調查感到焦慮。

#### （七）少年觀護所興建案

在 1999 年初，該市根據康乃迪克州的規劃，打算建立一間少年觀護所，所以準備徵用 B.C. Sand & Gravel 公司名下的土地。B.C. Sand & Gravel 掌握了 Pinto，同意支付給他 \$100,000 美元，如果他成功阻止了這項徵用。Pinto 把協議告訴了 Ganim，然後 Ganim 便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改變了該市徵用的立場，也迫使了州政府放棄了這個興建項目。結果，Pinto 收到了 B.C. Sand & Gravel 付給的報酬。Pinto 將一半的費用，依據他們的通常協議方式提供給 Ganim。

#### （八）聯合物業及 Dollar-A-Square-Foot

1998 年和 1999 年間，聯合地產公司的負責人 Lenocis 正在尋求開發這個城市的土地，其中包括一個叫 Father Panik 的地區，另一個叫 Steel Point 區。Lenocis 和 Pinto 達成了一項交易，聯合物業將為他們在這個城市建造的每一平方英尺空間支付給 Pinto \$1 美元。同樣地，Pinto 要用一部分錢來“照

顧”Ganim，而作為交換的是，他會遊說爭取給 Lenocis 一份長期租約以發展 Father Panik 區域。2000 年，該市為發展 Steel Point 地區而招標。在同年 11 月與 Pinto 和 Ganim 的一次會面上，Lenocis 承諾將為 Ganim 的州長競選活動籌資 \$500,000 美元，以換取 Steel Point 地區的標案。但是，Lenocis 並沒有參與投標，當時聯邦調查局正展開對聯物業的搜查。由於 Father Panik 和 Steel Point 兩件標案都沒有實現，所以 Ganim 和 Pinto 自然沒有收到有關這些計畫案的酬金。

#### （九）不實所得申報

在 1998 年和 1999 年的所得申報表中，Ganim 沒有申報 \$47,996 美元和 \$265,733 美元，分別由 Pinto 和 Grimaldi 提供的現金和餽贈物品，包括 Grimaldi 支付給 Ganim 妻子的部分。

#### 二、被告否認全部指控

Ganim 在審判中為自己出庭作證辯護。他承認，Pinto 和 Grimaldi 為他提供了現金、膳食、衣服、葡萄酒和其他禮物，但他辯稱這是出於友誼或合法的遊說活動。他否認收受任何財物以作為交換官方的’作為’，他並且否認與 Pinto 和 Grimaldi 簽訂了任何酬金分享的協議，也否認與他們是“夥伴”關係，也不知道任何 Pinto 和 Grimaldi 之間的交易，並且抗辯他的決定都只有為該市最佳利益著想所行使的職務上行為。另外，Ganim 證實他的妻子曾為 Grimaldi 工作過，但抗辯他們沒有申報她的工資是無心的過失。他也承認購買人壽保險是由市政預算支付，不過否認是秘密購買或未經市議會同意購買的。

#### （一）大陪審團起訴書

在 1997 年至 2001 年間，聯邦調查局和美國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對該市的公務員貪腐進行調查。2001 年 10 月 31 日，美國康乃迪克州聯邦地方法院的大陪審團對 Ganim 提出 24 項指控。2002 年 3 月 27 日，大陪審團確定了一份涵蓋相同指控罪名的起訴書。於是本案的訴訟程式啟動。

起訴書中的第 1 項罪名，指控 Ganim 與 Pinto 和 Grimaldi 共同實行索賄、期約、違背職務行為，構成美國聯邦法貪污腐敗罪（RICO）<sup>18</sup>，並且列舉了 11 項的不正行為。第 2 項罪名，指控 Ganim 共謀實施違背職務行為罪。第 3 項至 21 項罪名，係與貪腐罪行重疊的各種行為，分別以觸犯下面各罪起訴：敲詐勒索<sup>19</sup>、郵件欺詐<sup>20</sup>、賄賂<sup>21</sup>，涉及多起聯邦銀行資金的索賄、以及共謀收賄<sup>22</sup>。第 22 項和第 23 項指控為公務員不實所得申報<sup>23</sup>。第 24 項是抵抗沒收命令<sup>24</sup>。Ganim 被判入監服刑 108 個月。

#### （二）陪審團審判

Ganim 的審判於 2003 年 1 月 8 日展開，持續了 10 周。在本案法庭活動結束後交由陪審團之前，檢察官同意第 18 項和第 21 項的指控撤銷，其理由與本上訴案無關。俟評議八天後，陪審團裁斷 22 項的起訴罪名中有 16 項成立。

#### 三、原審法院拒絕重新量刑

2003 年 7 月 1 日，原審法院判處

<sup>18</sup> 18 U.S.C. §1962(c).

<sup>19</sup> Hobbs Act, 18 U.S.C. §§1951 & 1952.

<sup>20</sup> 18 U.S.C. §§1341 & 1346.

<sup>21</sup> 18 U.S.C. §666.

<sup>22</sup> 18 U.S.C. §371.

<sup>23</sup> 26 U.S.C. §7206(1).

<sup>24</sup> 18 U.S.C. §1963.

上訴人 9 年有期徒刑，這是量刑範圍的最高刑罰（得處 87 個月以上 108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另外法院還對 Ganim 處以 \$150,000 美元的罰金，命他向布里奇波特能源公司和該市政府支付共計 \$148,617 美元的賠償金，以及沒收他從企業索賄獲得的 \$175,000 美元。

Ganim 及時上訴，但在本案受理審理期間，恰逢美國最高法院宣告兩起上訴案的裁判結果，分別為 Booker 案和 Crosby 案。本院根據 Crosby 案判決意旨，准核 Ganim 要求重新量刑的聲請，並將本案發回聯邦地方法院。惟聯邦地方法院拒絕了 Ganim 重新量刑的聲情，並解釋在相同量刑範圍下，不會有實質的差別刑罰。

#### 四、「客觀認定」法則確立

查 Ganim 的上訴理由中，主要係針對陪審團認定其行為構成貪腐犯罪的證據不服，並提出了若干質疑。參照原審認定的各項罪名、觸犯的聯邦法律條文，康乃迪克州法典 53a-148 條所列之貪腐罪相關條文規定。誠如本院下面的說明，這些法律條文的文義在某種程度上將「交換」視為構成要件，即一名政府官員收受某種利益，以換取他在行使官方職權時做出決定或履行允諾行為。換言之，Ganim 不服陪審團裁斷他所犯下的罪行，事實上只有挑戰一個問題：那就是，要證明公務員履行一項未來行為的允諾和構成貪腐罪行的前提，必須要先證明被告有收受利益且與其職務行為之間存在具體連結的證明，方足以認定有罪。上訴人執此指摘，本院不表同意，

並藉此判決揭示：一個公務人員以履行官方行為的允諾去交換一種利益，或此所指職權行為在未來時機出現時行使落實，也可以構成貪污相關犯罪的要件。亦即我國法院所稱之對價關係（利益交換）存在，收受財物、索賄、期約與圖利特定對象的職務行為之間，並無先後順序之差別，亦無庸被告本人為直接收受人，更不問被告主觀想法（因為貪污共犯結構的最高層級行為人，絕大多數不會承認知情）；一旦中間人（聯繫人）、收受酬金人（白手套）、交付賄款人等指證歷歷，客觀上已足證明者，罪行即告成立。

美國聯邦第二巡迴上訴審法院同時援引幾則判決要旨的演進說明，如在 Evans 案中，聯邦法院曾判決揭示<sup>25</sup>：公務員在官方權利色彩下去進行引導賄賂的行為，尚非構成敲詐勒索罪的唯一要素。法院還發現，審判法庭給陪審團的指示中：如果公務員收受的錢，是為換取或具體要求他或她去行使官方權力者，那麼便可以定罪。此要件滿足了 McCormick 案的判決要旨。法院復再補充：在公務員收到付款以交換其執行具體官方行為的協議時，敲詐勒索罪即告成立；用以交換的「報酬」本身不是犯罪的構成要件（舉例，圖利他人）。因此，法院的結論是，檢方只需要證明，一名公務員獲得了某種利益，而他知道該項利益是作為官方行為的報酬。

<sup>25</sup> Evans v. United States, 504 U.S. 255, 112 S.Ct. 1881, 119 L.Ed.2d 57 (1992).

嗣在 Garcia 案的判決中，本法院調和了 McCormick 和 Evans 案的判決意見，重申：固然 McCormick 案法院指出，對於官方權利色彩下所涉及競選捐款的情況，只有當某筆捐獻款項是為了換取公務員明示允諾或去作為不執行官方行為時，才屬貪腐規範下的勒索。Evan 案判決修正了該判斷標準，並揭示其亦能適用於非政黨捐獻的案件，亦即，檢方只需證明<sup>26</sup>：公務員收受了某筆非屬於他的款項，而那筆款項他知道是作為官方行為回報（報酬）的表現。

從甘迺迪大法官在 Evans 案的協同意見書中，我們發現，在非屬政黨選舉捐獻的情境下，要維持一項定罪，必須要有一個交換條件（*quid pro quo*），但此條件的‘協議’是可以隱含在那名公務人員的言詞和行動中的，因為，要非如此，法律的效力將會因為「合意眨眼和點頭」而挫敗<sup>27</sup>。參照 Garcia 案的事實情節與本案的情況相似，查過去幾年，紐約眾議員 Robert Garcia 曾向一家國防承包商公司索取資金和貸款，以聯邦計劃案作為交換，並為其向銀行和政府機構關說請託。Garcia 案中採用了三要件檢驗法則，但後來經本院廢棄不再援用，而只留下一項判斷法則。故在該案後的 Coyne 案，Albany 縣政府的首長從一家公司的所有者那裡勒索（索賄）了 3 萬美元的‘資金’，他則幫該公司取得了

一份獲利可觀的市政工程契約<sup>28</sup>。本院判決確立了原審法院給陪審團的指示正確，即在判斷被告有否構成貪污相關犯罪的一條檢驗法則：如果你發現他獲得了一筆他無權得到的金錢（利益），而他知道這筆錢是作為官方某種行為的回報而不是自願贈與或與被告職權範圍無關的，那麼你便發現了被告犯有這一罪行。被告不需要藉由他的行為去明確誘使一筆酬金，但他必須知道款項的支付是為了換取他行使特定的官方權力行為。據此，檢方不需要去證明某筆款項的支付就是一個明確作為執行特定行為允諾的報酬。相反地，一名公務員瞭解到付款人（利益報酬提供者）是期待該筆錢運作影響力達到某個結果已足。

由上，本案聯邦法官的判決意旨和我國貪污治罪條例第 10 條後段規定雷同，「經檢察官或法院於偵查、審判程式中命本人證明來源合法而未能證明者，視為其犯罪所得。」

## 伍、結論

揆諸世界各國的司法部門，無有不將企業金融犯罪、公務員貪瀆之治理列為二十一世紀首要工作重點的，前者危害社會經濟秩序，後者妨礙社會進步安定。我國司法部門亦努力朝此方面積極改革建設，尤其近兩年貪腐相關案件的破獲提升許多，已逐漸展現我國打擊此類犯罪的決心和成效。惟檢視我國最高法院判決有關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的上訴案件，駁回檢

<sup>26</sup> United States v. Garcia, 992 F.2d 409 (2d Cir.1993).

<sup>27</sup> Evans, 504 U.S. at 274, 112 S.Ct. 1881 (1992). quoting Kennedy, J., concurring.

<sup>28</sup> United States v. Coyne, 4 F.3d 100 (2d Cir.1993).

察官上訴案件的比例仍顯偏高，下面是極少數一件採納檢察官上訴理由，推翻二審判決之案件，頗具例示作用，畢竟‘小貪’案件能查辦，‘大貪’案件應該也能查辦。援引該案參考<sup>29</sup>：

檢察官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某係法務部矯正署某監獄中央台主任管理員；另一名被告吳某擔任炊場主管；被告戴某擔任第六工場主管。被告三人，均為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緣簡○精因強盜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7 年 10 月確定，並於民國 97 年 8 月 21 日在某監獄服刑，分配至第六工場作業。簡○精明知其不具炊事專長，竟於得悉可以經由外面關係活動處理調用作業後，趁其母邱○瑩與友人陳○○玉前來探監時，委請尋覓有力人士向○○監獄人員行賄疏通。邱○瑩、陳○○玉乃透過簡○梅、簡○雄向被告三人行賄，由邱○瑩自其農會存款帳戶提款，於同年 11 月間，分 3 次支付新臺幣 5 萬元、5 萬元及 2 萬 2,000 元（總計 12 萬 2,000 元）賄賂予陳○○玉（陳○○玉私下扣取 3 萬 2,000 元）。再由陳○○玉在臺北縣三重市某工地，分次轉交付賄款共計 9 萬元予簡○雄，再由簡○雄透過張○隆向張某行賄。張某經由張○隆得知簡○精有意調至炊場作業，並已期約、收受賄賂後，與吳、戴共同基於對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聯絡，由吳於 97 年 11 月 5 日提出調用簡○精至炊場作業之申請，待申請通過後，再由戴於同年 12 月 2 日告知簡○精順利調動至炊場之事，簡並於次

日順利調至炊場作業等情，因認被告三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對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罪嫌等語。惟經審理結果，原審認為不能證明被告三人有公訴意旨所指犯罪，因而撤銷第一審被告三人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諭知無罪。

法院撤銷原判決理由：原判決僅就簡、張之測謊鑑定所為設題是否妥適有所質疑，或不是針對有無交付賄款予被告三人，即不採測謊鑑定結果，不免速斷，已有可議。另簡於第一審均陳稱：伊未主動申請調用至炊場（只是要到「小單位」），從來沒有人徵詢或詢問過此事。是到炊場後才見到吳，及向吳說伊有在臺南監獄炊場作業過等語。而本件申請書上游○龍之擬辦意見有記載「經訪談該受刑人性行穩定」。如未有具體請託甚至金錢介入其事，以簡○精、邱○瑩與被告三人可謂素昧平生，吳○有可能自動自發、無緣無故申請調用簡○精由第六工場至炊場作業，並經戴○以第六工場主管身分註記簡○精「性行良好」，因而成就其事；倘有所謂於申請前進行公開徵詢、訪談，簡○精豈有可能於吳○提出申請後經過一段時間猶渾然不知；戴○苟未參與其事，豈會如簡○精所指一再主動就調用至「小單位」事與簡○精多所接觸，俱有疑竇存在。原判決未進一步就上情調查、審酌，並敘明取捨證據所憑理由，即說明參酌遊○龍於第一審證述「簡○精之調用視同作業申請書上教區科員欄為其簽註核章，上載有『經訪談該受刑人性行

<sup>29</sup> 最高法院 106 年臺上字第 13 號刑事判決。

穩定』一語，其原則上均係授權需求單位主管直接進行訪談，其再詢問單位主管訪談結果，並參考原單位主管於申請書上簽擬之意見，核與吳○所證一致，則其確有為本案調用進行訪談受刑人簡○精，應可採信」，遽行採信被告三人所辯有就調用受刑人至炊場作業事在第六工場公開遴選、進行訪談云云，而為有利於三人之認定，與卷內事證未盡相符，又未為必要之論敘說明，有欠允當。

本案爭點在於公務員收賄與實現允諾行為之間的連接，應達到何種證明程度。美國聯邦法院對於要成立貪污犯罪的關鍵在「人證」、不明來源所得，已有深刻體悟。又此類犯案手法一次成功後，行為人會再複製相同經驗，而熟練的過程通常不易留下證物，俟一旦犯罪次數增加，涉及的層面越大、牽扯的對象越多時，始有可能出現破綻或檢舉情事，故而檢警從追查至發現此類犯罪往往也須歷經一段時間。承審本案的最高法院第九刑庭法官分析細膩，值得肯定。誠如從美國最高法院 Kennedy 大法官所言，貪腐相關罪的構成，必定存在一個交換條件（*quid pro quo*），但此條件的「協議」是可以隱含在系爭公務員的言詞和行動中的；要非如此，法律的效力將會因為「合意眨眼、點頭」而挫敗<sup>30</sup>。

---

<sup>30</sup> Evans, 504 U.S. at 274, 112 S.Ct. 1881 (1992).



陸、法學英文

一、原文裁判摘要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Second Circuit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ppellee, v. Joseph P. GANIM,  
Defendant-Appellant.

Docket No. 03-1448-cr.

Decided: December 04, 2007

Defendant-appellant Joseph P. Ganim (“Ganim”), the former mayor of Bridgeport, Connecticut, appeals from the judg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nnecticut (Arterton, J.). Ganim was convicted, after a jury trial, of racketeering in violation of 18 U.S.C. §1962(c); racketeering conspiracy in violation of 18 U.S.C. §1962(d); extortion in violation of 18 U.S.C. §1951; honest services mail fraud in violation of 18 U.S.C. §§1341 & 1346; bribery involving programs receiving federal funds in violation of 18 U.S.C. §666(a)(1)(B); conspiracy to commit bribery in violation of 18 U.S.C. §371; and filing false income tax returns in violation of 26 U.S.C. §7206(1). Ganim was sentenced principally to 108 months' imprisonment for his offenses.

On appeal, Ganim contends that in order to prove his guilt (on all but the tax crimes), the government was required to link each alleged benefit Ganim received to a specific official act he performed.<sup>1</sup> We hold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not required to allege or to prove that type of direct link, and conclude that the jury was properly charged on the law. In a separate summary order filed today, we reject Ganim's other challenges to his conviction and sentence, and hold that: (1) the indictment and bills of particular sufficiently informed Ganim of the charges against him; (2) the prosecutor's closing remarks did not amount to misconduct warranting reversal; (3) the district court did not err in declining to recess jury deliberations after a juror reported that she may have been fired from her job; and (4) Ganim's resentencing process under *United States v. Crosby*, 397 F.3d 103 (2d Cir.2005) was constitutional and his sentence was reasonable. We Affirm the judgment below.

BACKGROUND

## I. Offense Conduct<sup>2</sup>

Ganim served as the mayor of Bridgeport, Connecticut (the “City”) from 1991 through the time of his conviction in 2003. As mayor, Ganim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overall operation of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among other responsibilities, had final authority over the City's contracts. During his first campaign for mayor, Ganim became acquainted with Leonard J. Grimaldi (“Grimaldi”), who acted as a media advisor, and Paul J. Pinto (“Pinto”), who began as his driver and aide. Ganim developed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Grimaldi and Pinto over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Grimaldi subsequently formed a public relations company called Harbor Communications, of which he was the sole proprietor and employee. Pinto became associated with (and later purchased an ownership interest in) the Kasper Group, a Bridgeport architecture and engineering firm.

### A. PSG Contract Bid

In 1995 and 1996, Bridgeport was considering privatizing its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Ganim suggested that Grimaldi contact Professional Services Group (“PSG”) to act as PSG's public relations consultant in connection with its bid for the water treatment contract. Grimaldi then contacted PSG, which retained him as a consultant for a fee of \$30,000. PSG submitted a proposal for the contract, as did U.S. Water, a competing firm which was represented by Pinto and by United Properties. The owners of United Properties, Albert Lenoci, Sr. and Albert Lenoci, Jr. (the “Lenocis”), were Ganim's political benefactors.

After the bids were submitted, Ganim told Pinto that he had decided to award the contract to PSG, but that Pinto should arrange a financial deal between PSG and United Properties because Ganim did not want to choose between big supporters. Ganim told Pinto that “[i]f they want the deal, they'll do it.” In turn, Pinto explained to Grimaldi that if PSG wanted to win the contract, it would have to “take care of the Lenocis.” Grimaldi acquiesced, as did PSG upon his advice. PSG agreed to pay Grimaldi \$70,000 more per year for the contract's duration, which he was to pass on to Pinto and the Lenocis. Pinto informed Ganim of the deal, and Ganim approved the selection of PSG to operate the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Between May 1997 and April 1999, PSG paid Grimaldi roughly \$311,396 in consulting fees, much but not all of which Grimaldi paid to Pinto. Grimaldi and Pinto used some portion of this money to provide Ganim benefits such as entertainment, meals and clothing.

#### B. Fifty-Fifty Fee Sharing Agreement

In December 1996, Ganim traveled with Pinto and Grimaldi to Tucson, Arizona. During the trip, Ganim told them they should “join forces” by agreeing to split any consulting fees they earned through future dealings with the City, and that Ganim would steer contracts to the pair, in return for which they would “take care of” his expenses and needs. Upon returning to Bridgeport, the three men met to confirm the agreement. Grimaldi testified that during that meeting, he and Pinto agreed that:

a portion of that money [from the agreement] would be to take care of [Ganim]. If he needed cash, we would take care of him. If he needed suits, we'd take care of him. If he needed shirts, we'd take care of him. Any needs that he required, off of that 50/50 arrangement, we would take care of [Ganim]. In exchange for that, [Ganim] would make sure that all of our clients would get work from the city if they wanted it, that he would steer city contracts and jobs to our clients.

Pursuant to the fee sharing agreement, Ganim steered certain projects (some of which are discussed below) to Pinto's and Grimaldi's clients from February 1997 to April 1999. Meanwhile, Grimaldi and Pinto provided Ganim with cash, meals, fitness equipment, designer clothing, wine, jewelry and other items. Also at around that time, Grimaldi employed Ganim's wife. At Ganim's insistence, Grimaldi overpaid her, gave her payments in cash and did not report her income to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 C. Bridgeport Energy-Funded Programs

In 1998, Ganim had Grimaldi arrange for Bridgeport Energy-one of Grimaldi's clients-to contribute one million dollars to fund a promotional advertising campaign and the City's “Clean & Green” program, which demolished and rehabilitated blighted properties. Ganim then arranged for Grimaldi to oversee the advertising campaign and for one of the Lenocis' firms, represented by Pinto, to administer the Clean & Green monies. Pursuant to the fee-sharing agreement, Grimaldi and Pinto used a portion of their consulting fees for these programs to benefit Ganim.

#### D. PSG Contract Extension & One-Third-Each Fee Sharing

In late 1998, PSG sought a long-term extension of its contract to operate the City's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In a meeting with Grimaldi and Pinto, Ganim told Grimaldi that he would support the contract extension. In exchange, Grimaldi was to renegotiate his contract with PSG to get more of his consulting fees up front. Ganim

also directed that the three men would split those fees-as well as fees from all future deals with the City-one-third each. Grimaldi was to pay Ganim's share to Pinto, who would hold the fees for Ganim. Following these discussions, Grimaldi successfully renegotiated his consulting fees with PSG, such that he was paid \$495,000 in a front-loaded deal. On May 27, 1999, Ganim awarded PSG the contract extension. Over several weeks Grimaldi paid Pinto roughly two-thirds of the consulting fee, one third of which was for Ganim. Pinto kept Ganim's share mixed with his own money to avoid detection.

Throughout most of 1999, Grimaldi and Pinto provided Ganim-upon his request-with money and benefits such as wine, cabinets, home improvements and meals. Pinto stated at trial that “I was holding [Ganim's] money. When he needed the money, I'd give it to him or use it the way he directed me to.”

In September 1999, Ganim and Grimaldi had a “falling out,” and eventually Grimaldi stopped paying Ganim's portion of the money to Pinto. From that point forward, Ganim shunned Grimaldi and prevented his clients from obtaining contracts with the City.

#### E. Life Insurance Policy

In early 1999, Ganim sought to use City funds to purchase a one-million-dollar life insurance policy for himself, as well as for certain City department heads as “cover.” He approached Frank Sullivan (“Sullivan”), a childhood friend who had become a stockbroker, about brokering the deal. Ganim approved the purchase of the policies in April 1999 without the City Council's approval. After the purchase of the policies was leaked to the media, Ganim wrote to The Hartford Life Insurance Company to request that his own policy be terminated, but did not fill out the appropriate paperwork so that the policy would remain in effect. At the end of the fiscal year, Ganim had the funding for the policies inserted as one of many summary budget transfers, which were approved by the City Council.

Sullivan received a \$17,500 commission for serving as the broker for Ganim's policy. Acting on behalf of Ganim, Pinto advised Sullivan that if Sullivan wanted to do more business with the City, he would have to pay a kickback. Sullivan subsequently paid \$5,000 in cash for Ganim and Pinto to share.

#### F. Pension Plans

In the fall of 1999, Sullivan sought to become the broker of record for two municipal pension plans, “Plan A” and “Plan B.” Ganim had Pinto tell Sullivan that

if he wanted the position, Sullivan would have to give fifty percent of his commissions to Ganim and Pinto. With Ganim's support, Sullivan was appointed as the broker for the Plan B pension in September 1999. The following year, and again with Ganim's support, the Director of Finance for the City of Bridgeport retained Sullivan's investment firm to assist the city in underwriting the Plan A pension. Sullivan received \$38,000 as the first installment of his brokerage commission, which he intended to split with Pinto and Ganim. They did not request their respective cuts, however, as they had become anxious about the pending federal investigation against them.

#### G. Juvenile Detention Facility

In early 1999, the City, pursuant to a State of Connecticut project, was attempting to condemn property owned by B.C. Sand & Gravel in order to build a juvenile detention facility. B.C. Sand & Gravel retained Pinto, agreeing to pay him \$100,000 if he successfully stopped the condemnation. Pinto informed Ganim of the agreement, who then exercised his influence to change the City's position on the condemnation. The State ultimately abandoned the project, and, as a result, Pinto received his fee from B.C. Sand & Gravel. Pinto held half of that fee for Ganim's benefit pursuant to their usual fee sharing arrangement, and from that sum provided Ganim with cash and benefits upon his request.

#### H. United Properties & Dollar-A-Square-Foot

The Lenocis, principals of United Properties, were seeking in 1998 and 1999 to develop tracts of land in the City, including a site called Father Panik and another called Steel Point. The Lenocis and Pinto worked out a deal whereby United Properties would pay Pinto one dollar for each square foot of space they constructed in the City in the future. Pinto was to use some of that money to “take care of” Ganim, who in turn lobbied to get the Lenocis a long-term lease to develop Father Panik. In 2000, the City sought bids to develop Steel Point. In a November 2000 meeting with Pinto and Ganim, the Lenocis promised to raise \$500,000 for Ganim's anticipated gubernatorial campaign in exchange for his commitment to get them the Steel Point project. But the Lenocis did not bid on the project when federal search warrants were executed at United Properties. Because neither the Father Panik nor the Steel Point projects materialized, Ganim and Pinto received no money in connection with these projects.

## I. False Income Tax Returns

On his 1998 and 1999 income tax returns, Ganim failed to report as income \$47,996 and \$265,733, respectively, in cash and benefits provided by Pinto and Grimaldi, including the sums Grimaldi paid to Ganim's wife.

## J. Ganim's Defense

Ganim testified in his own defense at trial. He acknowledged that Pinto and Grimaldi provided him with cash, meals, clothing, wine and other gifts, but claimed they did so out of friendship or legitimate lobbying activity. He denied receiving any gifts in exchange for official acts, denied entering any fee-sharing agreement with Pinto and Grimaldi, denied being “partners” with them or being aware of the deals between Pinto and Grimaldi, and claimed that he acted only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ity.

Ganim confirmed that his wife had worked for Grimaldi, but claimed that their failure to report her wages was inadvertent. He also admitted acquiring a life insurance policy paid for by City funds but denied having purchased it secretly or without proper City Council authorization.

## II. Judicial Proceedings

### A. Indictment

Between 1997 and 2001,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nd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conducted an investigation of municipal corruption in the City. On October 31, 2001, a grand jury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nnecticut returned a twenty-four count indictment against Ganim, and on March 27, 2002, the grand jury returned a superseding indictment containing the same charges.

Count 1 alleged that Ganim, along with Pinto and Grimaldi, conducted a racketeering enterprise in violation of the 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 18 U.S.C. §1962(c) (“RICO”), and listed eleven predicate racketeering acts. Count 2 alleged conspiracy to conduct a racketeering enterprise. Counts 3-21, which overlapped with many of the predicate RICO acts, were separately charged as the following crimes: (1) extortion in violation of the Hobbs Act, 18 U.S.C. §§1951 & 1952; (2) mail fraud in violation of 18 U.S.C. §§1341 & 1346; (3) bribery involving programs receiving federal funds (“federal programs bribery”) in violation of 18 U.S.C. §666; and (4) conspiracy under 18 U.S.C. §371

to commit bribery under 18 U.S.C. §666. Counts 22 and 23 alleged the filing of false tax returns in violation of 28 U.S.C. §7206(1). Count 24 was a forfeiture count under 18 U.S.C. §1963.

#### B. The Trial and Verdict

Ganim's trial commenced on January 8, 2003, and lasted ten weeks. Before the case was submitted to the jury, Counts 18 and 21 of the indictment were dismissed for reasons not relevant here. After deliberating for eight days, the jury returned a verdict convicting Ganim on 16 of the remaining 22 counts.

#### C. Sentencing

On July 1, 2003, the district court sentenced Ganim principally to nine years' imprisonment, the top of the 87-108 months Sentencing Guidelines range, followed by a three-year term of supervised release. The court also imposed a fine upon Ganim in the sum of \$150,000, ordered him to pay restitution to Bridgeport Energy and to the City in the total amount of \$148,617, and ordered Ganim to forfeit \$175,000 in proceeds derived from the racketeering enterprise.

Ganim timely appealed, but before briefing was complete, the Supreme Court issued its decision in *United States v. Booker*, 543 U.S. 220, 125 S.Ct. 738, 160 L.Ed.2d 621 (2005), and this Court issued its decision in *United States v. Crosby*, 397 F.3d 103 (2d Cir.2005). Pursuant to *Crosby*, this Court remanded Ganim's case to the district court. The district court rejected Ganim's request for resentencing, concluding that it would not have imposed a materially different sentence under an advisory guidelines regime. *United States v. Ganim*, 01 Cr. 263(JBA), 2006 WL 1210984, at 3 (D.Conn. May 5, 2006). Our jurisdiction was reinstated when Ganim notified this Court of the district court's decision.

#### DISCUSSION

Ganim challenges the jury charges given on the bribery-related crimes at issue: (1) extortion in violation of the Hobbs Act, 18 U.S.C. §1951; (2) "honest services mail fraud" in violation of 18 U.S.C. §§1341 & 1346; (3) federal programs bribery in violation of 18 U.S.C. §666(a)(1)(b); and (4) bribe receiving in violation of Connecticut General Statutes section 53a-148 3 (collectively, the "bribery-related crimes"). As explained further below, each of these statutes criminalizes, in some respect, a quid pro quo agreement-to wit, a government official's receipt of a benefit in exchange for an act he has performed, or promised to perform, in the exercise of

his official authority. Ganim's challenges to the jury charge primarily relate to a single issue: namely, whether proof of a government official's promise to perform a future, but unspecified, official act is sufficient to demonstrate the requisite quid pro quo for a conviction. Ganim essentially claims that at the time a quid pro quo agreement is reached, a direct link must exist between a benefit received and a specifically identified official act. We disagree, and hold that the requisite quid pro quo for the crimes at issue may be satisfied upon a showing that a government official received a benefit in exchange for his promise to perform official acts or to perform such acts as the opportunities arise.

\*\*\*

### CONCLUSION

For the foregoing reasons, we hold that the jury instructions required the jury to find a sufficiently specific nexus between the personal benefits Ganim received and the official acts he agreed to perform in return for them. And for the additional reasons discussed in our accompanying summary order, we Affirm the judgment of conviction.

### 二、實用法律語彙

- |                                  |  |
|----------------------------------|--|
| 1. pursuant to 依照，按照             | 18. legal framework 法律體制               |
| 2. long-term lease 長期租約          | 19. inconsistent with 與...不符           |
| 3. federal search warrants 聯邦搜查令 | 20. general statute 普通成文法規             |
| 4. execute 執行（命令）                | 21. de novo 重新                         |
| 5. in connection with 與...有關     | 22. express promise 明示允諾               |
| 6. life insurance policy 人壽保險單   | 23. implied consent 默示同意               |
| 7. authorization 授權，批准           | 24. to the extent 在某種程度上               |
| 8. indictment 大陪審團起訴書            | 25. at regular intervals 定期、每隔一<br>定時間 |
| 9. racketeering 敲詐勒索             |  |
| 10. bribery 賄賂                   |  |
| 11. in violation of 違背，違犯        |  |
| 12. release on parole 假釋         |  |
| 13. derived from 來自於             |  |
| 14. taken as a whole 總體來說        |  |
| 15. quid pro quo 相等物、對價物         |  |
| 16. false pretenses 欺騙、不實行為      |  |
| 17. engaged in 正忙於，正著手於          |  |